

※書刊評介※

評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①

陳建華*著 唐亦璋**譯

最近出版的魏晉玄學方面的著作，戴璉璋教授的《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是很值得重視的一本書，因為它以辯證的方式詮釋「無」與「有」的核心觀念。它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它聚焦於內在的觀念，論述新道家「有」與「無」的課題，修正了一般人的玄學發展史觀。此書從王弼「返無全有」、「因有明無」的辯證模式，到郭象的「非無非有」、「即有即無」，把三世紀到四世紀新道家的發展，其哲學特質引人注意地呈現出來。因此，它超越思想史上許多傳統方法的著作，像是介紹社會政治背景、順著時序框架描述（如：正始玄學……），或提供哲學家傳記資料等等。相反地，它幾乎純粹致力於尋找「無」與「有」在歷史演變中的內在邏輯，縝密地分析它們在觀念上之相同與迥異、反復與變化的關係。

其次，不同於一般假設王弼主張「無」的理論（崇無論），以及郭象主張「有」的理論（崇有論），戴氏強調「有」與「無」有辯證的關係：在王著中，「無」不能離開「有」，郭著反之亦然。戴氏用他的新的辯證模式，細緻圓融地澄清了它們的不同，他的論辯有著分析的精確。

第三，本書從較寬廣的視野立論，一方面集中在新道家內在的發展，另一方面它亦打開了文化的層面，誠如書名「文化發展」所示。它闡明王弼的哲學是由阮

* 陳建華，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 唐亦璋，淡江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① 本文原來的標題是：“Dai, Lianzhang 戴璉璋, *Metaphysical Wisdom, Metaphysical Principl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玄思、玄理與文化發展》. Taipei: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刊登於 *, Vol. II, No. 2 (Summer 2003), pp. 336-339。今徵得該刊主編與原作者香港科技大學陳建華教授同意，將原文譯成中文刊登。*

籍、嵇康接踵，他們追隨著新道家思想，將之表現在音樂、繪畫的理論中。戴氏同時又彰顯出郭象的新道家思想如何被融入新佛學的發展線索，後者的代表人物是僧肇、成玄英。

這本書開始於這些問題：魏晉玄學從先秦道家繼承了些什麼？它自身發展出些什麼？「新」在新道家是什麼意思？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戴氏首先描述出「道」這一核心觀念在《老子》、《莊子》中的特色，儘管兩者有相異之處，他們共同地對於有限的生命周旋於現實而生的「大患」表現出終極的關懷。他們主張返回自然便是完成自我，堅信「無」與「有」的互動是「道」的觀念形成方式；在《老子》中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說法，《莊子》則以為在「坐忘」中人能產生洞悟世情的能力。基於道家形上智慧與原理，戴氏慎選出六位人物：繼老子、莊子的是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僧肇與成玄英，道家思想主流便隨其觀念與原理發展下去。

在這一歷史的脈絡中，王弼被充分地評估，基於他對道家傳統的貢獻；通過他注釋的《老子》，王弼強調辯證上的「無」只有被「有」證實。值得注意的是，戴氏發現的王弼理論：「返無全有」、「因有明無」，不僅超越了王弼乃是「無」的理論家的一般說法，就方法論而言，戴氏的「無」與「有」辯證模式的發現是精細的，這該歸功於他細心地閱讀，把握到王弼思想的整體結構。稱它為「模式」或許還可討論，但經由他結構性地詮釋，戴氏成功地證明了魏晉新道家的新特質。

有趣的是，戴氏常在他著作中用身體的隱喻，如脈絡、血脈，使人聯想到人體複雜的結構。在某種意義上，戴氏採用文本研究，並強調生活經驗在這些人身上以及新道家思想形成上的重要，顯然地他試圖找出王弼注《老子》及《易經》——道家與儒家的經典——在辯證模式系統的一致性。就如戴氏宣稱，由於注釋《易經》，王弼通過道家形上智慧及原理，闡明了儒家經典。

在詳析王弼著名的注釋「象」、「言」、「意」，企圖將王弼「無」與「有」的模式解釋清楚時，戴氏似有不足之處。學者們一直都被王氏含糊的《周易略例》所迷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原著頁 53）既然言能充分地解釋象，為何王氏要說「得象而忘言」（原著頁 53）？這是道家思想關鍵性的問題，在《老子》及《莊子》書中都提到藉文字獲得「道」的不足。就戴氏對王氏新道家發展的觀點，戴氏強調得好，「象」很難定義，因它開放，可有多種意涵，在充分

把握「象」時，任何言辭、觀念都有它的限制，但就詮釋「盡象莫若言」，戴氏似乎作了簡易的妥協。戴氏甚至精妙地指出，就王弼而言，「象」在獲得「道」上，也有其限制。在他清晰說明發現（王氏）辯證模式時，戴氏令人信服地指出，王氏並沒有反對用「言」及「象」去表明「道」；王氏的理論既不緊抓「象」，也不緊抓「言」，這顯示戴氏洞悉了「象」、「言」、「意」在道家學說運用的過程中的關係。然而，迷團仍在。當戴氏強調王弼予《易經》文字以合理地位，以為這些文字可以充分地解釋「象」，以免它在詮釋過程中意義被扭曲，新問題也就接著產生：為何《易經》文字可以超越作為「無」(non-being) 的終極之道的檢驗？難道道家有關「言」、「象」的立場在王弼新道家思想中失去了它的突出性？

在其他魏晉玄學的研究中，阮籍、嵇康常被認為是重要的章節，「名教」與「自然」的論爭也常被政治、或文學地解讀，但在戴氏的著作中，由於結合了王氏的辯證玄學，道與儒的論爭不僅更強調它形而上的一面——就「自然」在阮籍，「名理」在嵇康而論，這結合也顯示戴氏學術的架構方法是植根於「血脉」的隱喻。由於形上研究擴及至音樂與繪畫的理論，有機文化的概念亦隱然浮現。或許就因該書既有研究的方法，又有透視的深度，使它既紮實又有趣。

評論郭象的關鍵問題「自生」，戴氏強調，生是它自己生，獨立於任何外在，意味著一徹底擺脫無的觀念，這觀念主導著自王弼以來的魏晉玄學。而自生的觀念，擁有自動性、原初性、純素性、自足性等等特質。戴氏似乎堅信郭象的觀點主張「有」(Being)，幾乎不能與「非無非有」的辯證模式相一貫，這是戴氏在本書緒論裏將郭氏定型的。然而，把自生觀念植根於道家的自然，戴氏列舉出它源自《老子》、《莊子》相關連的一些例證，不可否認，郭象根除了道家思想中「道」與「無」的說法。

在他高度評價郭氏「精當而獨到地」建立哲學的新系統時，戴氏這樣寫道：他（郭象）「繼承傳統思想，因應時代問題」（原著頁291），「從這裏我們可以肯定郭氏在魏晉玄學思想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代表性地位」（原著頁291）。不言而喻，由於他哲學的創發與成就，郭氏在中國哲學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雖然如此，它必然引發一個問題：「魏晉玄學發展的主軸觀念『無』被根除了，這意味著什麼？」這似乎意指郭氏是否為「代表性人物」大大地取決於如何定義、評估魏晉玄學。例如：歷史唯物主義學者湯一介提到郭氏，把他視為中國哲學史上一大思想家，因他把道家主觀主義的「無」的觀念作了個總結。倘若從語言的觀點，「無」字的概念

清楚地指出，不僅是哲學上的「不存在」，也是語言學上「不存在」的記號，我們可以說，環繞著「無」的爭辯性意義，魏晉玄學繼承了老莊思想，展現出我們讚賞的中國思想史上最精彩的一段時期，它機智、詭異、玩語言遊戲、富形上論辯、呈現精彩壯觀，就這樣看，到底郭氏是終結了魏晉玄學，還是發展了它？

就內在的研究而言，戴氏著作應被高度肯定，由於他把環繞著「無」與「有」的重種複雜分歧的觀念精微的梳理，同時也創造地重建辯證型範，作為新道家的一項重大成就。然而，魏晉玄學緊繫著歷史上這段時期的意識型態，掙扎於儒與道之間，把這一哲學運動與政治、文化脈絡相連，可以使我們弄清楚的將不僅只是統治階級權力的關係，及主流的文人，還有在哲學論辯之後的邊緣團體，同時也包含捲入權力關係的個別思想家。誠如戴氏所言，郭象避免用「無」的觀念，主要是因它易引起思想混亂，或許更糟的是，在他同時代的文人道德的淪喪。這個提示，可助我們更好地瞭解郭氏玄學轉變的性質，他開啟了新的方向。

論玄學之所以玄 ——敬答陳建華教授

戴璉璋*

香港科技大學陳建華教授對於拙著《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 II, No. 2 (Summer 2003)。

很佩服陳教授細心地閱讀這本約二十七萬字的拙著。他對其中基本論點的肯定，給予我很大鼓勵；他對部分論述的質疑，則引起我反省：是觀念有偏差？抑或論證有疏失？無論如何，身為作者，自有不可迴避的責任，必須提出回應。

陳教授的質疑，大致是在王弼與郭象兩人的相關論述方面。王氏部分，重點在

* 戴璉璋，本所兼任研究員。